

# 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略

夏立平 云新雷

**摘要：**在全球南方兴起与中国崛起并行的百年大变局时代，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带给人类社会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全球南方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治理领域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和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使其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在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进程中，实现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共同演进，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既能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向平等有序与普惠包容的正确方向发展，也能实现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共同演进；既能为全球南方不断兴起的良好势头注入强大动力，还能为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应对不确定的世界变局指明前进方向。与此同时，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存在着诸如中国与美西方大国博弈的时代特点、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主导权之争以及与区域国家能力不足的风险挑战等现实困境。鉴于此，中国需要在伙伴关系上，坚持对话协商；在安全格局上，坚持共建共享；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合作共赢；在文化交流上，坚持文明互鉴；在生态建设上，坚持绿色低碳，才能建成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全球南方，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外交；百年大变局；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4—08—23

**作者简介：**夏立平（1955—），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战略、全球治理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云新雷（1985—），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JZD056）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南方是基于二战后独立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到冷战期间的“第三世界”与“南方国家”概念演化而来，是一个集国际政治、经济和身份等多种诉求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sup>①</sup>在全球南方兴起与中国崛起并行的百年大变局时代，全球南方不仅被美西方国家高度关注，更成为新时代中国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并使之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变量。鉴于此，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新征程上，深入阐释和探析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战略定位、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和中国路径等很有必要。

## 一、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

面对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阵营对抗式”的集团政治和“保护主义式”的民粹经济政策给国际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携手全球南方构建安危与共、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既能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走向平等有序与普惠包容的正确方向，也能实现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共同演进。

第一，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多极化不断演进的基本趋势，也是国际社会走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法治诉求。这一历史发展大势既与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紧密相关，也与21世纪以来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紧密相关，更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紧密相关。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强调世界各国应把《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奉为国家间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坚持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平等成员，都能以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义务方式有序参与国际合作，共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在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南方始终是一支坚定且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其不断壮大展现出来的群体性崛起势头不但引动国际力量格局对比持续趋向“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更成为世界多极化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核心动力。因此，在单极化和两极化已经失去合法性的当今世界，中国携手全球南方构建命运共同体既能确保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程行稳致远，也能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

---

<sup>①</sup> 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16—117页。

其次，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是迈向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是包含历次工业革命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国际分工需要促成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不仅带来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还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sup>①</sup>然而，这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极大释放人类社会生产力与显著提高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造成各国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和国家内部的贫富极化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其催生的后果就是经济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逆流，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在此国际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已经以其高于美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鉴于此，中国锚定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既能缩小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也能为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最后，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共同演进的时代必然。在由各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里，同时也在由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里，任何包括双多边关系在内的国家间关系欲要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之所以要遵循历史前进的逻辑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尤其是体现在国际关系体系之中的国家间关系都需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sup>②</sup>溯及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存共荣的相互关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共同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共同发展。在这个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时代，更在这个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且共享未来的时代，共同演进是指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长期共存共荣和良性可持续互动，本质上是指以合作共赢的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① 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第3页。

② 刘望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 二、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定位

在全球南方兴起与中国崛起并行且促动国际力量分化重组的百年大变局时代，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不仅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实现，更事关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战略定位。

第一，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所在。作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从国内层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伟大成就，而且从国际层面体现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进程中，中国结合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地理区域、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提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倡议。比如，在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国、古巴和南非等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并发表联合宣言；在地区层面，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等命运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典范。<sup>①</sup>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集诸多双边和地区命运共同体于一体的开放包容体系，是一个涵盖不同空间范围的命运共同体的统一体。因此，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可谓自然而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言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践行大国使命的应有之义，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命运与共的根本需要。

第二，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确认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身份。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sup>②</sup>这意味着，在一个由诸多民族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国家身份的确认与认同具有国内国际双重维度属性。从国内维度看，国家身份意指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是国家之所以为“自我”而非“他者”的规定性；从国际维度看，国家身份涉及一个国家

---

<sup>①</sup>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年9月27日，第6版。

<sup>②</sup>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

对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知，是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认同。就中国的国家身份而言，虽然中国的国家身份历经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自我定位的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但自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起，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逐步且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并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立场和重要内容。究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内维度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即中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阶段根本地决定了中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sup>①</sup>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维度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认同。除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认定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重要一员，还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尊重。<sup>②</sup>因此，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同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

第三，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和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应有权利，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工业化历程，还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③</sup>直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唯物史观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必然选择，既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道路迷思，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因此，在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② 孙立鹏：《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无理又亏心》，《光明日报》，2023年8月15日，第16版。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不断探索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不仅使全球南方共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更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 三、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既能为全球南方不断兴起的良好势头注入强大动力，还能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应对愈加不确定的世界变局指明前进方向，极具重大的时代价值。

首先，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夯实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历史地看，全球南方大多有过被西方国家侵略、殖民、掠夺的悲惨经历。因此，自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政治上的普遍觉醒使得全球南方始终坚守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进而避免在大国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选边站队，争取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来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最终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民族复兴。比如，在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冷战时期，作为全球南方“前身”的亚非拉各国通过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万隆会议、1961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和1964年成立的“77国集团”，逐步形成一个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和反霸权主义的国家群体。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引发的世界力量格局变化，全球南方越发成为大国之间激烈博弈乃至争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对象。特别是面对乌克兰危机，全球南方既没有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完全跟从美西方孤立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要求。这充分表明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及其在百年大变局中的政治崛起，已经使其不断兴起，并成为平衡国际力量格局的重要角色。为此，作为当今世界一支愈来愈重要的战略力量，全球南方团结行动，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以联合自强的集体力量夯实自身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还能够一致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发挥重大作用。

其次，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宣示全球南方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法者，治之端也。”<sup>①</sup>在以规则建构秩序和以法治约束

---

<sup>①</sup>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9页。

强权的国际法治文明进程中,《联合国宪章》的缔结可谓意义重大且深远。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是奠定当代国际法秩序的基石,也是推动国际法治文明进程的制度性框架,更是维护国际社会公道正义的规则体系。所以,自加入《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后,全球南方始终秉持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普遍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非美西方大国意图强加给国际社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究其缘由,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美国在国际上强划阵营,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自身在盟友小圈子里打造的“家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sup>①</sup>这种规则观既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也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sup>②</sup>对全球南方而言,国际社会要保持公道正义,就应毫不动摇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一系列国际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来规范各国关系,不能搞“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也不能滥用基于“实力地位”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此,面对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现象,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提升全球南方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也能够宣示全球南方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更能够与全球南方一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聚焦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自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资本逐利的本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③</sup>“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④</sup>其产生的历史性后果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各国及其人民的殖民统治和血腥掠夺,致使其陷入落后和贫困化的悲惨境地。然而,随着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与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瓦解,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深刻认识到,要推进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就必须发展民族经济,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

① 寰宇平:《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藏霸权之心》,《人民日报》,2023年5月12日,第3版。

② 蔡从燕:《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全球南方及其人民。在此期间，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在科学研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国际形势下，对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战略、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sup>①</sup>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更是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通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各国聚焦发展议题，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助力。因此，站在全球发展的关键当口，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既能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正当权益、聚焦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也能有力推动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 四、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安全和文明三大时代主题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也为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造成现实困境。

第一，在地缘政治上，全球南方存在着中国与美西方大国博弈的时代特点。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随之结束。尽管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走向缓和，但世界政治的本质及其回归——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利益与财富的竞争——再次让美西方权力政治思维窠臼成为百年大变局时代中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特点。<sup>②</sup> 因而，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普遍崛起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美西方大国出于权力政治的惯性思维及其长期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惯习，遂将大国博弈乃至大国对抗重新带回世界政治舞台。换言之，在全球南方不断兴起与中国持续崛起并行的百年大变局时代，全球南方不仅是一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还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参与者，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更是大国博弈的当事方。具体来说：一方面，全球南方以其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与政治崛起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自身独有的政治立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明确反对

---

<sup>①</sup> 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04—105 页。

<sup>②</sup> 朱锋：《现实主义回归与中美战略博弈》，《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6—7 页。

美西方冷战式的地缘政治对抗。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两个月后，在美国发起的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问题特别会议上，分别有52个发展中国家不支持对俄制裁、82个发展中国家不支持暂停俄在人权理事会的会员资格。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趋向战略竞争的时代特征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以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关键支柱。在此意义上，这既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缘由所在，<sup>①</sup>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概念政治化、实体化从而实现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需求。<sup>②</sup>

第二，在领导角色上，全球南方存在着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主导权之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之所以越来越引起包括美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是因为全球南方的经济体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美西方发达国家集体，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大幅改变了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sup>③</sup>因此，基于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及其巨大的世界经济影响力，全球南方在处理与美西方发达国家集体的经济关系时，大都认同自身长期享有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与此同时，从构成全球南方的成员国家及其角色而言，印度、俄罗斯等国已对全球南方表现出主导权之争，即“谁”应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或“领头羊”角色。比如，面对中美博弈导致的地缘战略环境变化，印度不仅在地缘战略上积极配合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还在外交政策上试图通过争做全球南方的“领袖”、充当西方与全球南方的桥梁以及拓展“微型多边主义”来推进其在全球南方及国际舞台的影响力。<sup>④</sup>此外，鉴于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没有完全盲从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政治立场及实际行动，俄罗斯更是出于维护其大国地位的考量，力图通过外交、经济和舆论领域的接触，

---

① 夏立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第37页。

② 苑基荣：《美西方热炒“全球南方”离间不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人民网，2023年8月18日，<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3/0818/c1002-40059353.html>。

③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④ 朱玲玲：《印度对外战略新动向——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3页。

积极争取全球南方。<sup>①</sup>

第三，在全球治理上，全球南方存在着中国与区域国家能力不足的风险挑战。全球治理因应全球化问题而产生，既是一个多样性主体参与的多层次体系，又是以主权国家相互合作与竞争为主导的权力与权威框架。<sup>②</sup> 尽管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但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与自助性决定了各主权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或霸权国家往往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及诸多领域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者或主导者，而其他小国、弱国或穷国则因为能力不足而沦为相应规则和制度的接受者或跟随者。所以在一个由美西方霸权政治所开启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特别是全球南方大都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风险挑战，以致无法彻底推动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朝向公平正义的治理模式转变。例如，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能力而言，虽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硬能力的不充分、软硬能力的不平衡、主导能力的不足都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瓶颈。<sup>③</sup> 又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太平洋岛国由于均为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缺乏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先进技术，以致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普遍不足，使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sup>④</sup>

## 五、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路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携手各方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倡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守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初心，弘扬公道正义、平等包容的精神，践行发展振兴、合作共赢的使命。<sup>⑤</sup>

---

① 沈陈：《新兴大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立场与行动》，《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20页。

②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37页。

③ 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国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7页。

④ 余姣：《太平洋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3期，第69页。

⑤ 和音：《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3年9月20日，第2版。

鉴于此，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是：

第一，在伙伴关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全球南方。和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期望，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意义上，二战后获得民族解放和取得主权独立的中国与亚非拉各国都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和国际法义务，进而通过跨越国界的集体行动和联合自强，结成共同反对集团政治对抗的国际和平力量。在此国际进程中，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率先把建立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且主要方向是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在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与全球南方对话协商是为了推动中国—全球南方关系始终沿着独立自主和政治平等的正确轨道发展，也是为了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或结盟、或对抗的怪圈，从而走出一条迈向持久和平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因此，在以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全球南方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坚持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化解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还要把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视为国际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南方的不断兴起相互成就，为世界和平作出负责任的集体贡献。

第二，在安全格局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全球南方。追求和实现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也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全球南方是一个跨区域的国家群体，既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涵盖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所以面对诸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南方大多存在安全风险系数持续增大和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多重安全危机。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而言，中国不仅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为全球南方的总体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更是提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的重大现实意义就是在安全格局上推动共建共享的时代逻辑，即世界各国通过共建国际安全规则和机制来共享国际安全格局的建设成果。<sup>①</sup>同理，作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支柱，中国坚持与全球南方共建共享安全格局，既能通过共建安全规则来推进全球南方的集体安全行动，又能通过共享安全成果来保障全球南方共同安全的合法性，最终实现全球南方的普遍安全。

<sup>①</sup> 云新雷、夏立平：《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国际论坛》，2023年第2期，第16—17页。

第三，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全球南方。在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国际体系，发展不仅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对中国与全球南方而言，发展即为最大的安全。这是因为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安全就是发展，即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不断发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和潜能，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强与全球南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双多边经济合作，使得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成果惠及整个全球南方，从而在可持续互动的经济合作框架之下实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赢。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sup>①</sup>

第四，在文化交流上，坚持文明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南方。多样性是文明的实然状态，也是文明的本质特征。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虽然有的文明或因为战乱冲突或因为自然灾害等内外部环境巨大变化已经衰落甚或消亡，但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也是不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自我确证。在这个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多文明世界，已经有80多亿人口、2500多个民族和5000多种语言，这足以证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全球南方更是一个集人类文明多样性于一体的国家群体例证，既有传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中国，也有深受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影响至深的印度、伊朗等南亚与中东国家。处在这个不同文明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时代，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在实现不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为多样性文明身份的国家及人民的相互往来提供了文明交流准则。因此，面对“文明冲突论”的沉渣泛起，中国与全球南方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与论坛，持续丰富和扩大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内涵，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深厚情谊，从而建设一个多文明各美其美、开放包容的全球南方。

第五，在生态建设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全球南方。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要求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坚持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否则人类就会再次陷入

---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悲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生态价值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①</sup>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气候变化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灾难，全球南方更是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如脆弱人群多、减排压力大、美西方打压、发展不均衡等。<sup>②</sup>因此，作为全球生态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全球南方势在必行。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不仅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还积极支持全球南方当中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全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以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成效，为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贡献中国智慧。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底，中国已与 42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 52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系列援助与交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中国提供并动员的气候资金不仅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还为改善当地民生、提升人民福祉提供了帮助。<sup>③</sup>

## 六、结语

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兴起，他们求和平、促发展、担正义，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力量格局，赋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以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向来坚定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始终同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在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上，中国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南方的典范实践，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南方的生动展现，必将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平等有序与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建设性、稳定性和正能量，不断推动人类走向更加和平安宁、文明进步的美好未来。

[责任编辑：孙喜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9 页。

② 陈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30—32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2024 年 11 月 6 日，[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411/t20241106\\_1093618.shtml](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411/t20241106_1093618.shtml)。